

## 達摩年歲、原籍及來華年代之謎（續完）

——現代智識推理對胡適遺作「禪學案」觀點存疑之一——

海鳴

同一件事，經過不同的作者筆錄，即使是一時代同一天同一地的幾個作者，也還會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筆法，對於事實

有所不同的取捨，何況是不同時代的作者呢？我們試看今日今時發生的大事新聞，同一件事，各報章都會有各別大同小異的報導，重點各異，觀點有別，取捨編輯方法亦各有千秋。如果達摩是今天來到中國見到梁武帝，全世界各國的報紙電訊對這件新聞的報導，會不會人人都異口同詞呢？自然是美聯社的電訊與合衆社的又有不同角度，中央社的又不同了，這種道理，再簡單不過，我們怎可因為各社各報的報導差異就否定了有這件事實發生？我認為胡適的假設太過了，小心求證則未夠。

胡適只是就他所能找到的殘缺史料而遽下大胆假設。我認為他是太不「小心求證」了！以不完整的資料來作結論，亦未體會當時的社會情形及達摩的開宗宏法的努力決心，亦未衡量到當時的交通困難情況，以及當時中外貿易海運的情況，波斯人阿拉伯人來華的情況……他顯然都未予以列入考察，他那種只從殘缺不

全的紀錄去研究史料，那種方法，我認為在今日是過時而不合邏輯的。而且是非常不科學的。

胡適說：「……這一段記事，不但添了真功德，廓然無聖，對朕者誰，三條問答，並且還添上詳細的年月日，七世紀人所不記，八世紀人所不能詳，而十一世紀以下的人偏能寫出詳細的年月日，這豈非最奇怪的靈蹟嗎？這一件故事的演變可以表示達摩的傳說如何逐漸加詳，逐漸由唐初的樸素的史蹟而變成宋代的荒誕的神話，傳說如同滾雪球，越滾越大，其實禁不住史學的方法的日光，一照便銷溶淨盡了！」（胡適文存「菩提達摩考」三零一頁）。依胡適此理，他是二十世紀的人，又怎會知道得比十一世紀的多呢？

七世紀人不知，八世紀人不曉的事，而二十世紀的人都知道的詳細事，太多了！七世紀人知道地球的物理年齡嗎？但是二十世紀的人就知道！七世紀的人知道秦始皇的確實出生及死亡日期嗎？當然不知道，但是二十世紀的人就知道，因為發掘了秦王墓

出土了文物，考證了出來！七世紀的作者不知道達摩到達中國的年月日，八世紀的作者不知道達摩與梁武帝的對話詳情，但是十一世紀的傳燈錄就會知道，為什麼不能呢？十一世紀的作者難道不會去做考據工作嗎？難道中國自古以來只有胡適一人才會做考據？十一世紀的作者獲得的史料也許比胡適從巴黎博物館找到的更多，十一世紀的作者採用的史料，胡適得不到，就大胆地予以推翻了！這是什麼考據家的什麼方法？那麼武斷！

胡適動輒以巴黎圖書館藏敦煌寫本為無上權威，凡是敦煌本沒有記載的，他就予以否定。

敦煌寫本是不是具有絕對無上權威？是否絕對的「可靠」？怎知手寫本沒有偷工減料？沒有失缺？沒有遺漏？沒有刪減？沒有偽造？沒有竄改？沒有歪曲？

敦煌寫本被尊重，可能是因為它是最古的，但是，凡是最古的就最可靠嗎？從邏輯學上是講不通的！而且，曆代紀載的文字，都是由簡轉繁的，一代比一代繁複，古代的簡，未必就是可靠！

十一世紀傳燈錄作者找到資料考據，把達摩史料補充，不可以嗎？胡適有什麼合理的理論可以否定傳燈錄作者和歷代法寶記的內容是沒有經過考據的？胡適有什麼真憑實據可茲以推翻傳燈錄？沒有！縱觀胡作，武斷多於考據！胡適是一個基督教徒，我懷疑他可能有先入為主的主觀摒斥佛教的動機在內！

一個真正治學治史的人，不會那麼武斷否定歷史人物的種種記載，他可以存疑，却不可以推翻！更不可以毫無證據就妄斥古人是「……造出」神話，是「無數的謬說」。

胡適「書菩提達摩考後」一文，承認：「我假定菩提達摩到中國時在劉宋亡以前，宋亡在四七九年，故達摩來時至遲不得在四七九年以後，我的根據只是道宣僧傳中，『初達宋境南越』一語」。

這是他自己招認唯一的根據了，只有一處根據，顯然是太不

充份的證據了！

就算達摩是在宋亡（公元四七九年）以前來華，為什麼沒有可能見梁武帝呢？達摩不可以住在廣州住到學會中國話好些年才去金陵求見梁武帝嗎？（梁武帝普通元年是西公五一九年，故此胡適武斷達摩不可能見到梁武帝）這一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胡適在這篇續文內說：「今日重讀道宣僧傳，在僧副傳中又得一證據。」

「……性愛定靜，游無遠近，裹糧尋師，訪師不逮。有達摩禪師，善明觀行，循援巖穴，言問深博，遂從而出家，義無再問，一貫懷抱，尋端極緒，為定學宗焉……久之還返金陵，齊建武年，南遊揚輦，（我認為這兩句未必就是按照文氣時間先後排列的，可能與達摩無關）。卒於開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梁武普通五年也。」

「齊建武為西曆四九四—四九七，梁普通五年為五二四，僧副生時為四六四年，即宋孝武帝末年，建武元年他才三十歲……他從達摩受學，當在二十多歲，約當蕭齊的初期，西曆四八五—四九〇之間，其時達摩已在北方傳道了。以此推之，達摩到廣州當在宋亡以前，約當四七〇年（宋明帝泰始六年）左右，他在南方不久，即往北方，他在北方學得中國語言，即授徒傳法，僧副即是他的弟子中的一人。他當五二〇年左右還在洛陽瞻禮永寧寺，可見他在中國約有五十年之久，故雖隱居巖穴而能有不小的影響，他大概享高壽，故能自稱一百五十歲。」

這一大段文章，道理似是而非，胡適假定僧副二十多歲師事達摩，這一假定有什麼根據？僧副不可以在五六十歲才師事達摩嗎？「僧副傳」中並沒有說明在幾年幾歲拜師達摩。胡適根據什麼來肯定他是二十多歲拜師呢？我認胡適這樣武斷是為了用這一段文字來支持他的達摩不可能見到梁武帝」理論。

達摩學習中國語文，一定要到了北方才可開始嗎？胡適的推論說達摩在中國北方學得中國語言，即授徒傳法。我認為那也是毫無根據的武斷！

就常情而論，一個傳道者，多半在未到中國之前，就已經開始學習多多少少的中文了。像楞伽經那麼深奧的佛經，達摩若無相當的中文修養，怎能表達詞意及經文真髓？他既有志來震旦傳道開宗，難道不會在印度之時就已經學了一些中文？印度佛教僧人，那時代都風尚來華傳教，學習預科中文，必然亦是一時風尚罷？我認為達摩可能在印度時期已經在僧院學過若干中文，到了廣州也不斷補習，以後一路北上，都不斷在學習中文，很可能在廣州就已經多少能用中文講經了，你能想象一個完全不懂中文的僧人來到中國從頭學起牙牙學語一般講楞伽經嗎？你能想象到達摩會放心叫傳譯口譯那麼深奧的楞伽經嗎？

今天不是大多數外國的天主教教士都是先學了若干中文才來華傳教？

假如相信胡適的假定：達摩是不懂中文的，要到了北方才學會中文，怎符合一個宗教家宏教的懷抱？又怎能一路北上內地？直到今天，不會講普通話的廣東人進了內地都有旅行的困難，你不能想象一句中文也不懂的達摩從廣州步行經過湖南湖北進入中原嗎？如果胡適的假定可靠，那麼也等於他自己推翻了達摩直接從廣州陸路北上的假定了！

在那時代，從南到北，陸路一走半年，難道有今天的長途巴士？何況當時的湘鄂一帶路途因戰爭而混亂不靖，也沒有很多很著名的佛教寺廟可吸引達摩去參觀？而那時代，外國來華的商隊，一是從天山南北兩路進入中原，另一是循海道至廣州，再從廣州航海經溫州、杭州、揚州而進入中原與北方，那時波斯商船很多，我所以推測達摩可能是從廣州乘波斯商船經沿海抵杭州，再從彼處往蘇州、南京。然後渡長江北上至洛陽，（海運時間比陸路短得多）。

我推測達摩一到中國就一定先遍遊各地佛教叢林，觀察情況，尋找開宗機會及適當地點，他既到了金陵，梁武帝力倡佛教，沒有不邀見天竺高僧之理，達摩也自然希望獲得君王助力開宗，兩者相見，實乃合情合理之事。

我推測，達摩見過梁武帝之後，因見武帝不悟，無能為力，就渡長江北上，極可能先往洛陽參觀當時最宏偉的永寧寺，該寺在西元五三四年焚毀，胡適說達摩無可能在五二七年才到廣州，（原文：達摩在洛陽當此寺的全盛時期，當西曆五一六至五二六年，此可證景德傳燈錄所記載達摩於梁普通八年（五二七）年始到廣州之說是不正確的了。）

這裏有兩個問題：第一，景德傳燈錄各版本錯字誤刻甚多，所刊普通八年，有可能是「元」年之誤！抄寫的人或刻板者把元字誤刻爲八字，是很可能的，元字去了「二」頭，就像八字。我很疑心那本來是元字，只不知胡適用的哪一個版本？有無比較過各本？

鑒於僧副死於普通五年（西元五二四年），而僧副是達摩的弟子之一，所以，我同意胡適的假定達摩不可能是普通八年來華，但是我不同意胡適所稱僧副是二十多歲拜師達摩，（那是毫無根據的），我推想可能是在晚年拜師達摩的，也許是在五二〇年左右。

第二，永寧寺既是那麼重要的佛寺，難道火焚後就完全沒有重建？它既是太后胡氏所立的帝皇勅建佛寺，一旦被焚，帝皇怎會不予以重建？永寧寺火焚於五二〇年，以後有沒有重建？我不知道，這是題外了。胡適說達摩往遊永寧寺在五二〇年，那麼也相當符合達摩來華的初期年代——是普通元年或八年，（既然後者八年已被僧副的歿年五二四年所否定，那麼，達摩來華的年代在五二〇年左右，可能在武帝的普通元年亦非全無可能的，沒有理由叫我同意胡適的假設：達摩在四七〇年（宋明帝泰始六年）就到了廣州，挨到五十年後才去參觀天下聞名的第一名刹永寧寺，你能想象你到了泰國皇都，要學會泰文，住了五十年才去參拜著名的玉佛寺嗎？你能想象到了緬甸仰光，住了五十年才去參拜大金塔嗎？你能想象到了台灣住了五十年才去參拜佛光山嗎？

總之，從今日的常識和邏輯來看胡適禪學案，我發現胡適對

於達摩考據，是有太多自相矛盾和不合邏輯的武斷的，而且是史料不足的，我認為他這些考據尚待學者重新予以檢討，運用更多的資料與更冷靜公正的態度去重新再研究！我不是一個考據學家，只是從常識和邏輯觀念來分析而已，我也不敢說我的推論正確，或者很錯謬亦未可知。

胡適說：「八世紀淨覺作『楞伽師資記』，也沒有達摩與梁武帝相見問答的話」，「七世紀道宣作續高僧傳全無達摩見梁武帝事」，他就武斷否定了達摩會見梁武帝，他說「逐漸由唐初的樸素的史蹟變成宋代的荒誕的神話，傳說如同滾雪球，越滾越大，其實禁不住史學方法的日光，一照便消溶淨盡了。」

我認為胡適的考據太不夠小心，也太缺乏足夠的史料證據，他也太偏執，太武斷了！

胡適指責歷代作者偽造法統捏造達摩神話，我不明白為什麼一位會學過法律而又講求西方邏輯的學者，怎麼會那麼冒失武斷？以不充足的非直接證據來指控罪名？

一個嚴肅的學者，不應那麼隨便妄指誤導衆生！頂多只可說「存疑」而已！

拙文也只是反映對於胡適遺作的「存疑」，我認為他的「禪學案」，全部都有予以重新檢討的必要！我總覺得他有些蓄意破壞佛教的一切，就如他年青時大叫「打倒孔家店」一樣，可能是有些偏見在內的，並不是客觀的學術研究！佛教學者應該另外考據研究清楚，不容他的著作繼續魚目混珠地誤導衆生下去！

其實，只用常識也就足以推翻胡適的「禪學案」內許多不合邏輯的大胆假設了。

達摩見過梁武帝，達摩是一百五十歲，達摩是波斯人，達摩在武帝普通初年來華……我的推論認為都是有可能的！而且，我認為歷代作者都是佛教僧人為多，不可能毀戒而妄語捏造達摩的神話，容或有資料不同，但決非妄語！

(上接第41頁「受戒日記」)

而我們這些非長期出家的同道，則被安排在玉佛殿，聽永惺大和尚講說佛法。

九時正，泉慧法師已臨，大家起立恭迎。

法師頂禮膜拜畢，登上講壇，先有題外話說：「根據叢林規矩，凡有講事，聽講者進入講堂，第一必須肅立恭迎主講人，入座時，須清靜，要坐得四平八正（坐如鐘），不可東張西望，不可交頭接耳，不可隨意喧嘩，不可談笑自若，不可隨意離座，不可舉止失措。要一心一意的聽講，要全心全意的投入，能這樣的心領神會，自是得益良多，若有玩忽違例者，當遭值堂法師鞭以巨靈之掌。」

在泉慧法師講到鞭以巨靈之掌時，他運臂使腕，得心引手的拍的一聲（以掌擊桌），引得哄堂大笑。

大家都心知肚明，泉慧法師並不是無的放矢，因為他看着許多頗不入眼的——伏在桌子上去夢會周公，背向椅靠着去雲游四海，或則是低首合眼在發那清秋白日夢，還有那些時而搔首弄姿，時而擠眉弄眼，時而飲茶斟水，時而排坐如廁……

接着、泉慧大師也就言歸正傳的着墨講題了。

下午三時半，聽完了賢德法師四講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後，趁小休息的時候，特訪謁內明雜誌主編沈九成先生，用申久違、渴念之意，並畧談受戒意願與聽講感受，次及大會方面分發各同道（法師們則以戒子相稱）以弘一法師手書「弘一」英吋大小的影印本「戒香」二字，上款係一朱印佛像，下款署「一音」二字及篆陽「弘一」朱印。同道得此大師墨寶，竟有頗多人讀爲「香戒」，我的房內有一位大頭蝦，且頻頻以糾正之姿態導同道以原本不錯的「戒香」讀成「香戒」。

我本來想講一講個人的意見，此二字確應讀爲「戒香」而不可以「香戒」讀，更想講一講弘一法師的生平簡歷，但事實上，我話到口邊，還是強自咽了下去，一掉頭，就輕輕的走回房去了。

(未完)